

伯明翰监狱的来信

亲爱的牧师同工们

我在伯明翰市的监狱里阅读了你们最近的声明，该声明把我们当前的活动称为“不明智且不合时宜的”。

我鲜少停下来去回应那些对我工作和信念的批评。如果我回应办公桌上的所有批评的信件，那么我的秘书们除了回信将没有时间做其他事，而我也没有时间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但我感觉到你们是有正直品质的人，你们的批评也是真心提出的，因此我会尽力耐心和详细地回答你们的问题。

既然你们已受到“外界纷纷介入”一说的影响，我认为应当阐明自己在伯明翰的原因。作为南方基督教领袖大会的主席，我深感荣幸。该组织总部设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活动范围遍布南方各州。在南方该组织大约有85个附属机构，其中一个就是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我们时常与这些组织共享人力、教育和财政资源。几个月前，在伯明翰的组织询问我们，如果认为必要，是否应立即执行非暴力直接运动的计划。我们很赞同，表示等时机一到，就依计行事。我和几名助手是应邀来到伯明翰的，我来这儿是因为有一些组织上的关系在这里。

我来伯明翰更主要是因为这里存在着不公正。正如八世纪的先知们离开他们的小村落，把“上帝是这么说的”一话传到远离他们故乡的地方，正如使徒保罗离开他在塔尔苏斯的小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希腊-罗马世界的几乎每一个村庄和城市里，我也被迫把自由的福音带到我自己故乡以外的地方。和保罗一样，我必须回应从马其顿发出请求帮助的呼唤。

此外，我了解所有团体与各个州的关系。我不能无所事事地待在亚特兰大，也无法不担心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胁。我们被卷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关系网里，被披上了命运的外衣。如果任何的不公正对某个地方的公正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其他地方的公正有间接影响。我们不能再接受类似“外来煽动者”的狭隘观念。生活在美国境内的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外人。

你们对在伯明翰举行示威活动感到痛心。而我也很遗憾，你们的信件竟没有对引起示威的客观情况表示同样的关注。我相信你们没人愿意跟在肤浅的社会分析家身后，只看后果而不去设法解决其根源。示威游行发生在伯明翰是不幸的，但更不幸的是该市的白人政权逼得黑人居民走投无路，别无选择。

任何非暴力斗争都包括四个步骤：（1）收集情况以判断是否存在不公正；（2）谈判；（3）自我净化；（4）直接行动。在伯明翰我们已经经历了所有这些步骤。无庸质疑的是，种族不平等笼罩着该市的黑人社区。伯明翰可能是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该市警察暴行的丑恶记录众所周知。黑人在法庭遭受极其不公平的待遇。比起我国的其他城市，这里有更多尚未解决的黑人住宅和教堂的爆炸案。这些都是确凿而残酷的事实。在这样的基础上，黑人领袖试图与该市的领导者谈判，但总是遭到后者的拒绝。

去年九月，我们与伯明翰经济组织的领导们进行了一次谈判。其间，这些人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比如摘掉店门口带有歧视性的牌子等。于是弗雷德教士和亚拉巴马基督教人权运动组织的领袖同意停止所有的游行示威。随着日子

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发现自己被欺骗了。小部分的告示牌拿走了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而其他的则一直原封不动地挂着。

经过这么多的痛苦，我们的希望破灭了，失望的阴影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准备进行直接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媒介，让国内和国际上有良心的人来关注我们的遭遇。想到可能出现的困难，我们决定进行自我净化。我们展开了一系列有关非暴力的讨论，并且时常问自己：“你能接受被殴打而坚持不还手吗？”“你能忍受坐牢的痛苦吗？”我们决定在复活节期间进行直接行动，因为除了圣诞节，这是一年中主要的购物时间。由于直接行动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缩减，我们认为这是改变自身情况而向商人们施压的最好时机。

很快三月份将迎来伯明翰市长选举，于是我们马上决定把行动推迟至选举之后。当看到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牛”尤金·康纳为下一轮的选举拉到了足够的选票，我们决定再次把行动时间推至投票结束。这样才不会让示威行动把问题复杂化。和其他人一样，我们期望看到

康纳先生选举失利，因此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行动。为了改变黑人的状况，我们感到直接行动计划不能在延期。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直接行动？为什么要采取静坐、游行或其他手段？难道谈判不是更好的方式吗？”你们要求谈判的想法是正确的。事实上，这也是直接行动的最终目的。非暴力直接行动想方设法制造这种紧张局势，使得这个总是拒绝谈判的国家正视我们的要求。直接行动试图扩大影响，让人们不再忽视我们的要求。制造紧张局势是非暴力行动工作者的工作之一，也许有点骇人听闻。但必须承认的是，我并不害怕“紧张局势”这个词。我坚决反对充满暴力的紧张局势，然而一种积极的非暴力的紧张局势却是进步的必需。如同苏格拉底认为的那样，培养思想中的冲突是必要的，这样人们才能从迷茫和虚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进入能够主动分析和客观评价的自由国度中。我们要了解非暴力行动的倡议者在社会上制造紧张局势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人们从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的深渊中爬出来，来到相互理解和兄弟情谊的庄严的高山上。

我们的直接行动计划就是为了造成局势的紧张，从而打开谈判之门。在此我十分赞同你们提出谈判的意见。相对于对话，我们挚爱的南方已经陷在自言自语的泥沼中太久了。

你们信中的一个基本看法是我和我的组织在伯明翰发起的行动是不合时宜的。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不给新的政府足够的时间让他们替你们解决问题呢？”对这个问题我唯一能回答的是，在新的伯明翰政府有所作为之前，它和前一届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刺激。如果认为鲍特威尔先生当选市长会给伯明翰带来黄金时代，那我们将大错特错。尽管鲍特威尔先生比康纳先生更显温文尔雅，但他们都是种族隔离主义者，都致力于维持现状。我希望鲍特威尔先生可以清醒地意识到反对废除种族隔离是徒劳的。但假如没有来自公民权支持者的压力，或许他就不能意识到这一点。我的朋友们，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无法在缺乏合法与非暴力压力的条件下获得公民权。令人惋惜的一个历史事实是，特权阶层不可能自愿放弃他们手中的特权。普通人也许看到道德之光便会主动屏弃他们不公正的态度。可是，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所说，特权阶层比一般人更无耻。

痛苦的经验使我们懂得，自由绝不会由压迫者自动送上门；自由必须由被压迫者去争取。坦白说，我从未参加过根据某些人的时间表是“恰当时机”的直接抗争运动，那些人根本没受过种族隔离之苦。多年来，我一直听到“等待”这个词，每个黑人的耳朵都听腻了。“等待”几乎就是“永不行动”的同义词。我们的一位杰出律师说得很对：“公正被延误太久，就是公正被否定。”

对宪法和上帝赐予我们的权利，我们已经等待了340多年。亚洲和非洲国家正以喷射机的速度冲向政治独立的目标，而我们却仍在以老牛拖破车的步速去争取在便餐柜台喝上一杯咖啡。也许对那些没受过种族隔离痛苦的人来说，“等待”很容易。但是当你看到你的父母被无缘无故的刑罚惩处，还有你的兄弟姐妹被人因一时兴起而淹死；当你看到那些充满恨意的警察辱骂踢打甚至杀害你的黑人亲人时；当你看到将近两千万的黑人同胞虽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却窒息在密封的贫穷的箱子里时；当你得结结巴巴地和你六岁的女儿解释为何她不能到电视广告上的公共娱乐园玩耍，看到当她被告知黑人儿童不能进入游乐场而泪盈于睫，看到低人一等那不祥的乌云开始布满她年幼的心灵，以及看到她不知不觉对白人产生憎恨而人格开始变得扭曲时；当你不得不为你五岁儿子的问题“爸爸，为什么白人对我们黑人这么坏？”编造谎言时；当你驾车跨县，发现你只能在狭小的车厢里过夜，是因为没有汽车旅馆接受你时；当你日复一日被标有“白人”和“黑人”的牌子伤害时；当你的第一个名变成“黑鬼”，中间的名变成“小子”（不管你有多老），以及你最后的姓变成“约翰”，而且你的妻子和母亲永远得不到“夫人”这个尊称时；当你为自己是黑人日夜受煎熬，处于一个总是踮着脚的姿势，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以及被内心的恐惧和外在的怨恨烦扰时；当你永远为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奋斗时，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等待对于我们是如此之难。我们的忍耐力达到了极限，我们不想再沉浸于绝望的深渊里。先生们，我希望你们可以了解我们这种合理的无法忍受的焦躁。

你们对我们意欲违反法律表示极大的忧虑。这当然是合理的关注。既然我们如此奋力地催促人们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关于在公立学校取缔种族隔离的决定，那么发现我们有意识地去违反法律便会感觉很荒谬。有人或许要问：“你们怎么能既提倡违反某些法律，又提倡遵守另一些法律呢？”这里可以用存在着两种法律的事实来回答：既有公正的法律，又有不公正的法律。我愿第一个为遵守公正的法律大声疾呼。一个人不仅有法律上，更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反过来说，一个人有道义上的责任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我赞成圣奥古斯丁的话：“一个不公正的法律根本不是法律。”

那么公正与不公正的法律二者有何区别呢？人们怎样去判断一个法律是否公正呢？一个公正的法律是人制定的符合道德法则和上帝法则的法规。一个不公正的法律则是与道德法则不一致的模式。用圣托马斯·阿奎那斯的话来说，一个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并非植根于永恒和自然的人类法则。任何尊重人格的法律都是公正的，任何贬低人格的都是不公正的。一切种族隔离法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种族隔离扭曲灵魂，损害人格。它给予实行隔离者以虚假的优越感，给予被隔离者以错误的自卑感。借杰出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贝尔的说法，隔离用“我-它”关系取代“我-你”关系，把人降低到物的地位。因而种族隔离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学意义上是荒谬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错误和有罪的。保罗·蒂利希曾说过：罪恶即是分离。难道种族隔离不是人类悲惨分离的存在主义的表现，不是人类极度的疏远和可怕的罪孽的表现吗？因此我号召人们遵守最高法

院1954年的决定，因为它在道义上是正确的；我号召人们拒绝遵守隔离法，因为这些法令在道义上是错误的。

让我们对公正与不公正的法律举个更具体的例子。不公正的法律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遵守，却对他们自身没有约束力。这是区别对待的有特权的法律。同样，一个公正的法律是多数人强迫少数人遵守，同时自己也遵守的法令。这是真正人人平等的法律。

请允许我作另一种解释。不公正的法律是一种强加于少数人的法规。这些少数人不参与该法规的制定或创立，因为他们没有投票的权利。有谁能说颁布种族隔离法令的亚拉巴马州立法机关是民主产生的呢？整个亚拉巴马州用尽各种不正当的手段阻止黑人成为正式选民。在一些县里黑人虽占人口大多数，但却没有一个黑人登记参加投票。难道这样一个州确立的任何一项法律能被看作是民主制定的吗？

有时一个法律表面上是公正的，在实行过程中又是不公正的。比如，我曾因为游行未得到许可而被捕。然而，几乎没有哪项法令要求游行需要有许可证。可是当为了要保留种族隔离制度和剥夺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及示威的权利时，这样的法令竟出现了。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下面的话的意思。我并非像极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那样支持逃避和对抗法律，那会导致无政府状态。要打破不公正的法律，必须是采取合法手段，而且要有接受处罚的准备。我认为一个人去违抗法律是因为他意识到那是不公正的，而且还要有坐牢的心理准备，以此来唤起民众的关注，这才是对法律最高的尊重。

当然，这种形式的公民反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拒绝服从尼布甲尼撒的命令，有力的证明了在普通人中实施较高道德水准的法律是冒险的行为。早期的基督徒已经作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们宁愿以身饲虎以及遭受消除障碍时的极大痛苦，也不愿屈从于罗马帝国不公正的法律。学术自由今天成为现实是因为苏格拉底实行了全民对抗。在我们的国家里，波士顿倾茶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全民对抗。

我们决不能忘记，当年希特勒在德国干的每一个勾当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由战士在匈牙利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非法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帮助和安慰一个犹太人是“非法的”。但我相信，倘若当时我在德国，我一定会去帮助、安慰我的犹太弟兄们。倘若我今天生活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某些基督教信仰所珍视的原则遭到践踏，我一定会公开提倡拒绝遵守这种反宗教的法律。

信仰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弟兄们，我必须向你们供认两个事实。首先，在过去几年里，我已经对白人的温和派深深失望了，我几乎可以得出令人遗憾的结论，黑人迈向自由的巨大的绊脚石不是白人公民组织或三K党，而是白人温和派，他们执着于“秩序”而不是公平；比起拥有公平积极的和平，他们更喜欢缺少紧张气息消极的和平环境。他们总是说：“我同意你们追求的目标，但我无法认同你们采取直接行动的做法。”他们专横的认为他们可以为其他人的自由设定时间表；他们生活在虚构的时间框架里，而且一直建议黑人们等待一个“更合适的时机”。有良好愿望的人们浅薄的理解比怀有恶意的人们完全的误解更令人

沮丧，他们冷漠地接受比彻底地拒绝更让人悲哀。

我希望白人温和派能理解法律和命令存在的目的是建立公平，一旦违背了这个初衷，它们就变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的拦河坝。我也希望那些白人温和派能理解现在出现在南方的紧张局面，是一个必要的过渡，是黑人消极接受不公平待遇而形成的负面的和平转到人们相互尊重人格尊严的正面的和平的一个必然阶段。事实上，参与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我们并不是造成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我们只是让本来就存在的问题浮出水面而已。我们把问题公开化，那样它才能得到重视和解决。就像皮下的脓肿，只要它一天不被发现，就一天不能被治愈，所以必须把丑陋的它暴露在大自然的空气和阳光下。随着紧张局势的不断出现，不公正的情况也会逐渐暴露在人类良心的光芒和国家舆论的空气之中，这样才可能得到改善。

在来信中，你们坚持认为即使我们的行动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也要受到谴责，因为它们会促成暴力。可是这合乎逻辑推理吗？难道你能去批评被抢的人由于他的金钱而滋生了抢劫吗？难道你能去批评苏格拉底，因为他对真理和哲学执着的追求而造成了被误导的平民逼他喝下毒药吗？难道耶稣是因为他信奉的上帝意识和对传播上帝的旨意永不停息的奉献造成了他的磨难吗？我们应该看到，正如联邦法院一贯声称的那样，因为人们追求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会出现暴力行为而煽动人们放弃是错误的。国家必须保护被抢的人以及惩罚抢劫犯。

同时，我希望白人温和派可以抛弃关于时间与为自由而战的关系的误解。我曾收到一封发自得克萨斯州白人兄弟的信。他在信中写到：“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黑人最终将获得平等的权利，但你们在信仰上可能太冒进了。基督教花了将近两千年才实现目标。基督的教诲同样花了很长时间才传到人类中来。”这种观点是源于对时间错误的了解，是源于国内奇怪的观念，认为时间总会治愈一切伤痕。事实上，时间本身是公平的；它可以毁灭一切，也可以建设一切。我越来越感觉到恶人比善人在运用时间方面更有效率。我们不能不对这个时代感到痛心，不仅是因为坏人的恶语劣行，还有好人可怕的沉默。决不能依靠必然性车轮的滚动来实现人类进步；它是通过与上帝合作的人孜孜不倦地工作换来的，如果没有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将成为惰性力量的同谋。我们必须积极地运用时间，因为做对的事无论何时都是合适的。现在是实现真正民主承诺的时机，而且也是把即将发生在我们国家的挽歌变成高唱兄弟情谊赞歌的时机。现在正是把我们国家政策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转向相互尊重的坚硬的岩石上的时机。

你们把我们在伯明翰的活动称为极端的。起初我对教会同仁把我的非暴力斗争视为极端主义者的行为感到失望。我开始考虑这么一个实际情况，即我恰好站在黑人社会两股对立力量的中间。其中满足于现状的那股力量有两类黑人组成：一类黑人因长期遭受压迫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尊自重之心，适应了种族隔离；第二类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黑人，因享有某种程度学术和经济上的保障，又因有时从种族隔离中获利，他们已不自觉地变得对民众的疾苦麻木不仁了。另一股力量饱尝辛酸，充满仇恨，它危险地朝鼓吹暴力的方向发展。该势力体现于全国层出不穷的各种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其中最大最有名的是伊莱贾·穆罕默德的穆斯林运动。当代黑人对种族歧视继续存在的沮丧失望感使这一组

织应运而生，发展壮大，它由对美国失去信心的人组成，他们彻底否定基督教，并得出结论，认定白人是不可救药的“魔鬼”。

我设法站在这两股力量的中间，告诉他们不必追随满足现状者的“无作为主义”，也不必仿效黑人民族主义者的仇恨和绝望。因为有一种以博爱和非暴力抗议为手段的更好的途径。感谢上帝，通过黑人教会的影响，非暴力方式进入了我们的斗争。

假如没有这种非暴力哲学，那么我敢肯定此刻南方的许多街道早已血流成河了。而且我更相信，假如我们的白人兄弟把我们那些参加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人斥为“暴民煽动者”和“外来鼓动家”，且如果他们拒绝支持我们的非暴力斗争，那么成千上万绝望的黑人将从黑人民族主义思想中获取安慰和保护，这一发展趋势将必然导致恐怖的种族冲突的噩梦。

被压迫的人不可能永远被压迫，争取自由的浪潮终会来临，这是美国黑人的必由之路。心中有物提醒他记住自己天赋的自由权利，身外有物提醒他记住自己可以去争取这种权利。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黑人总会被时代精神所感染，和他在非洲的黑人兄弟，亚洲棕色和黄色皮肤的兄弟还有南美与加勒比海的弟兄们一样，美国黑人怀着急切的心情向那梦中种族平等的乐土前进。如果有人意识到了这种强烈的冲动充满了黑人社会，他就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游行示威。黑人有太多被压抑的怨恨和潜在的失意感，他必须把它们释放出来。所以，请允许他们游行；允许他们以朝圣者的身份到市政厅参谒；允许他们继续去争取自由，以及理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如果他们被压抑的情绪不能以非暴力的方式释放，他们将会寻找暴力的手段来宣泄。这不是在威胁你们，而是历史的事实。所以我用不着劝我的人们“丢掉不满”。当然，这种正常健康的负面情绪是可以引向非暴力斗争的正面出口的。而现在持这种态度的人却被认为是极端主义者。

然而当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却渐渐为自己被看作极端主义者而感到欣慰。难道耶稣不正是一个博爱的极端主义者吗？——“爱你的敌人，祝福诅咒你的人，为虐待你的人祈祷。”难道阿摩司不正是一个争取公正的极端主义者吗？——“让公正如洪水，正义如激流滚滚而来。”难道保罗不是一个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极端主义者吗？——“我在自己的身体上带着上帝的痕迹。”难道马丁·路德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吗？——“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所以拯救我吧，上帝！”难道约翰·班扬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吗？——“我将留在狱中直至我死去的那天，免得把自己的良心变成屠场。”难道亚伯拉罕·林肯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吗？——“这个国家不能在半奴隶半自由的状况下继续生存。”难道托马斯·杰弗逊不是一位极端主义者吗？——“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人人生而平等。”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要做极端主义者，而在于我们要做怎样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为仇恨服务的极端主义者还是做为爱服务的极端主义者？我们是做为保留不公平而战的极端主义者还是做为正义而战的极端主义者？在传说中有三个人受难于髑髅地。我们绝不会忘记他们受罪的原因——极端主义。其中有两个是罪恶的极端主义者，所以他们的地位被降低。另一个耶稣基督，他是为争取博爱、真理和正义的极端主义者，所以他的地位被提升。在南方，在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都非常需要这样正直的极端主义者。

我希望白人温和派可以看到这种需要。大概我过于乐观了，亦或期望太

高了。我早已认识到在压迫阶级中只有少数人能听到被压迫阶级深深的叹息和了解他们强烈的渴望，更少的人能明白只有通过坚定不移、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根除不平等。然而，我很庆幸南方的一些白人兄弟已领会到了这次社会革命的意义，而且他们表明自己将投身其中。他们的数量依然很少，但他们的力量却不容忽视。例如拉尔夫·麦基，莉莉安·史密斯，哈利·格登，詹姆斯·麦布赖德·达布斯，安妮·布雷登和莎拉·帕顿·波依尔为我们写下了雄辩而带预见性的战斗檄文。其他人则与我们行进在南方不知名的小路上。他们在肮脏、到处是烟蒂的监狱里受折磨，遭到那些认为他们是“肮脏的黑鬼的支持者”的警察的辱骂及残酷的对待。不像其他那些白人兄弟姐妹那样，他们认识到时间的紧迫和有效的“行动”是战胜种族隔离诟病的良药。

让我继续写下我的失望。对白人教会和它们的领导我很失望。当然，也有例外。我很在意你们每个人在这次冲突中的立场。在此我要赞扬牧师斯特林，因为你的宗教立场是反对种族隔离的，你欢迎黑人进入教堂做礼拜。我要称赞这个州的天主教领袖，因为几年前在春山学院已经废除了隔离。

但除此之外，我不得不重申自己对教会的失望。我并不是像那些消极的评论家那样对教会吹毛求疵。作为一个传播福音的牧师，我非常热爱教会；在教会的怀抱中成长，我得到了教会精神力量的支持，只要生命之绳不断延长我就一直保持忠诚。

几年前一个偶然机会我成为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抗运动的领导者，我以为白人教会会支持我们，以为南方的白人神父、牧师和教士们会是我们最强大的同盟。相反，他们中有些是坚决的反对者，他们拒绝了解自由运动，而且诽谤运动的领袖；其他的则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令人麻痹的彩色玻璃窗后面保持沉默。

尽管我的梦想破灭了，我还是怀着希望来到了伯明翰。我希望这个地方的白人宗教领袖能够看到我们事业的正义所在，而且急我们之所急，可以作为一种媒介，让权利阶层听到我们的不满。

我一直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明白，但我又一次失望了。

我曾听到许多南方白人宗教领袖批评他们的信徒遵守废除种族隔离法律的做法，然而我也常听到这些白人牧师发表声明：“要遵守法律，因为‘融合’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因为黑人是你们的兄弟。”但在黑人遭受明显不公正待遇时，我看到白人牧师站在边界上，满口虔诚地说着不相干的伪善的琐事。在为摆脱我们国家种族与经济不平等进行坚决战斗时，我却听到许多神父说：“那些都是社会问题，与宗教无关。”我还看到有许多教会把他们自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宗教信仰里，在那里可以按《圣经》把身体和灵魂分开，可以把神圣与世俗分开。

我已周游了亚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和南方其他各州。在炎热的夏日和秋高气爽的早晨，我看到一座座外观美丽的教堂的尖塔直插云霄，注意到南方在营造大批宗教教育场所上不惜工本。我一次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暗自发问：“谁在这里做礼拜？谁是他们的上帝？当巴尼特州长大谈干预，鼓吹拒绝执行国会法令时，他们的声音上哪儿去了？当华莱士州长公然号召反抗，煽动仇恨时，他们的声音上哪儿去了？当满身伤痕、疲惫不堪的黑人决定从满足现状的黑暗

地牢冲向积极反抗的光明山峰时，他们支持的声音哪里去了？”

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带着深深的失望，我为教会的软弱无能哭泣。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眼泪是为爱而流的。实在是爱之深，悲之切。是的，我非常热爱教会，不然我怎么会流泪呢？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我所处的位置相当特别。我把教会看成耶稣的身体。但是我们却因为不关心社会问题，害怕被当成不守常规的人而使这个身体受到伤害和玷污。

以前的教会很有号召力，那时基督徒们都乐意为信仰做牺牲。当时教会不仅是记录流行思想和观点的温度计，而且还是改变社会观念的温度调节装置。每当早期的基督徒进入一个乡镇，那里的统治者就感到不安，立刻宣布那些基督徒是“和平破坏者”和“外来煽动者”。但基督徒坚持认为他们是“从天堂来的使者”，号召人们遵从上帝的而不是人的旨意。虽然人数不多，但力量强大。由于他们过于沉醉在传播上帝的旨意，也就没有被看成是“极大的威胁”。不过通过他们的努力和行动，结束了像杀害婴儿和角斗士这类旧时的灾难。

现在就大不一样了。当代教会常常只是发出微弱、无效、摇摆不定的声音。它常常是维持现状的主要支持者。普通地区的权利机构不但不会对教会的存在感到不安，而且因教会的缄默，因教会常对现状表示认可而感到欣慰。

但上帝对教会的审判从未像现在这样严厉。如果当今的教会无法恢复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它将丧失权威的光环，失去成千上百万人对它的忠诚，被人们当作对20世纪毫无意义、无关宏旨的社会团体。每天我都碰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对教会的失望已经演变成了明显的厌恶。

也许我又一次表现得太乐观了。有组织的宗教阶级会不会因为太安于现状而不去拯救我们的国家和世界呢？为了达到目标，或许我应该把信仰转到内心世界的教会里，因为内心的教会存在于现实的教会中。我要再次感谢上帝，因为有组织的宗教阶层中某些高尚的人已从束缚手脚、令人瘫痪的锁链中挣脱出来，积极加入我们为自由而战的队伍里。他们离开安全的教会，和我们一起走在乔治亚州奥尔巴尼市的街上。他们从南方的高速路上来到为争取自由的小道上。他们还和我们一起被关进监狱。有些甚至被教会开除，失去主教和教会同仁的支持。但他们依然怀着这样的信念踏上征程：正义即使被击败也比取得胜利的邪恶强大。他们的证言已成为精神食盐，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用于保存福音的真理。他们已经在失望的黑暗山洞中凿通了一条希望的隧道。

我想所有的教会都会面临这么个重要的挑战。但即便教会不援助正义，我对未来也不会绝望。即使我们的动机目前仍被误解，对于我们在伯明翰斗争的结果我也不担心。我们将在伯明翰和全美国达到自由的目标，因为美国的目标就是自由。虽然我们有可能被辱骂、被嘲笑，我们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在清教徒到达普里茅斯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这里了。在杰弗逊写下庄严的《独立宣言》响彻历史之前，我们就在这里了。我们的祖先们已经在这个国家无偿劳动超过了两个世纪；他们使美国成为了棉花大国；他们在建造主人的房屋时遭受了明显的不平等待遇及不堪回首的屈辱。他们以无穷的活力不断地创造繁荣和进步。如果连奴隶制难以形容的残暴都不能阻止我们，那现在我们面对的对手将注定失败。我们终将赢得自由，因为我们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国家神圣的遗产和上帝永恒的意志。

在结束前我有必要提一提困扰我多日的在你们信中的另一个观点。你们竟热情地称赞伯明翰警察在维持秩序和阻止暴力方面的贡献。我怀疑如果你们看到警犬攻击那些手无寸铁无辜的黑人群众；看到黑人在城市监狱里受到非人待遇；看到那些警察推倒和辱骂黑人老妪及黑人幼孩；看到他们拒绝给我们提供食物是因为我们想进行餐前谢恩祈祷；看到他们殴打黑人老人和年轻小伙子时，是否还会表扬他们。所以我实在无法苟同你们赞扬伯明翰的警察。

警察在逮捕示威者时使用了暴力。但他们却要在公众面前标榜他们是“非暴力”的。目的何在呢？是为了保护种族隔离这个邪恶的体系。在过去几年中，我一直声明，非暴力要求我们使用的方式必须和我们追求的结果一样纯洁。我试图让人们明白，运用不道德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目的是错误的。现在我必须指出用道德的手段保护不道德的目的更是错误的。或许康纳先生和他的警察下属在公众面前表现得是非暴力的，如乔治亚州奥尔巴尼市的警察局长普利切特表现的那样。然而他们正是在用非暴力这种正义手段去保护种族不平等非正义的结果。正像T.S.艾略特说的：“最后的诱惑是最大的背叛：为坏的理由做好事。”

我希望你们能称赞伯明翰黑人静坐者和游行者的非凡勇气。总有一天，南方会认识到谁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将是詹姆斯·梅雷迪思们，以极大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面对暴徒的嘲笑和敌视，面对令人痛苦的孤独，而这些正是先驱者的特点。他们将是年迈而饱受压迫欺凌的黑人妇女，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72岁的老妪为典型。她怀着自尊感与决心不乘坐实行隔离的公共汽车的黑人同胞们一起站立，对询问她是否疲倦的人作了语法不规范但却颇有深度的回答：“我的脚很累，但我的心是安宁的。”他们将是年轻的大中学的学生、年轻的福音传教牧师和大批年长者，勇敢而又和平地在便餐柜台静坐抗议，为了问心无愧而宁愿坐牢。总有一天，南方会明白，当这些被剥夺继承权的上帝的孩子们在便餐柜台坐下时，他们实际上是为实现美国梦的最佳理想，为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最神圣的准则挺身而出，从而把整个国家带回到民主的伟大源泉，那里有建国的先辈们在拟订《宪法》和《独立宣言》时所开掘的深深的源泉。

我从未写过这么长的信，我担心它太长会耽误你们宝贵的时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假如给我一张舒适点的桌子，我会把信写得更简短些。但当一个人被孤单地关在一间小牢房里，他除了写长信，思考和做更多的祈祷外，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在信中我夸大了事实和显露了无理的焦躁，请你们原谅。如果我说了什么不符真相和有损兄弟情谊的话语，我请求上帝的原谅。

希望这封信能使你们坚定信念。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很快与你们每一位见面，不以一个主张取消种族隔离的人或一位民权运动的领袖身份，而是作为一个牧师和基督教兄弟的身份。让我们共同期盼种族偏见的乌云很快散开，误解的浓雾从我们不安定的社区消散；让我们期盼在不远的明天，博爱和兄弟情谊的灿烂星辰将以美丽的光华照亮我们伟大的国家。

为和平和博爱事业奋斗的

马丁·路德·金